

# 不抵抗不行：江桥抗战为全面抗战树立了榜样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不抵抗的状态。而在江桥，马占山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面对强敌，体现了中国人敢于抗争的勇气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牺牲精神。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未能得逞。此后，日本与俄国在东北地区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协议》，从俄国手中夺走中东铁路南段的控制权和抚顺煤矿经营权，东北南部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次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日本除拥有铁路所有权外，还拥有铁路两侧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土地，附属地总面积达482.9平方公里。另外，每10公里可驻兵15名，南满铁路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据点。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奉行军事优先原则，培养大批职业军人；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引起军界不满。1923年，曾在欧洲各国任武官等职的佐级军官回国后，为推行其扩充军队，扩大战争的方针，常在东京一家法式西餐厅“二叶亭”聚会，“二叶会”因此得名，他们通过这个组织宣传法西斯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力。

日本侵华的准备

1927年7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同时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再通过篡改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归属，该提议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也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1928年，在“二叶会”的宣传下陆军大学第21—25期毕业生也成立“无名会”，在聚会之上，时任陆军大学教官的石原莞尔中佐提出“立体战争论”。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与“无名会”合并组成一夕会。冈村宁次、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战犯，正是来自一夕会。

1928年，蒋介石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发动二次北伐，6月，张作霖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由于一年前，日本田中内阁向张作霖索取铁路控制权未果。于是，张作霖在回程途中遇害。12月29日，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北伐随之结束。这也表明了奉系军阀与日本田中内阁的决裂。

从1929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多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为侵略做准备。1931年4月，日本第2师团进驻辽阳。又从东京调运两门24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29联队，炮口对准北大营和机场。驻朝鲜的第19、20师团向中朝边境集结，准备从图们江、鸭绿江两个方向越境支援关东军。7月，将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调任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以及板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至此，日军在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了。

中国的情况

在日本准备侵华之际，1929年3月，蒋介石以北伐结束，军费不足为由裁撤桂系军队，引起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双方军队在两湖之地大打出手，战争以桂系军阀战败告终，但蒋桂两方的余波未平。一年后，为争夺对中央政府控制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组成地方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展开长达半年的内战。这场在中原地区进行的“中原大战”双方共动员150万军队，伤亡30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中华大地在历经4年北伐战争后，又深陷两次大战的泥潭，使原本不富裕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在中国的几路军阀，为各自地盘相互争夺之时。日本已在东北埋下一颗颗侵华的地雷，只需要一个借口，随时引爆。

日本的借口

每次日本在发动对外战争之时，都会想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次也不例外，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骗取万宝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引起中朝两国争端。日本方面通过《朝鲜日报》造假新闻，称200多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同时以维护日侨在朝安全，增兵朝鲜半岛。同年6月，日本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后被当地驻防的中国东北军第3团所部拘获后，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其一行4人处死。日军对中村一行间谍活动闭口不谈，反诬中国

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九一八”事件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领1个分队破坏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并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驻扎在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北路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南路是第2师团第29联队，进攻沈阳。

而东北的主政长官张学良正在北平，得知北大营腹背受敌的情报时，并未下令还击，反而向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荣臻传达不抵抗命令。仅620团（欠第1营）王铁山团长率部反击，在其掩护下第7旅官兵撤离了北大营。一支600名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在一夜之间占领了驻扎6800人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第7旅官兵伤亡失踪800余人，而日军仅伤亡40余人。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第29联分两路向沈阳挺进：两路分别进攻商埠地南、北市场，另一路进攻沈阳内城。由于东北驻军先接到不抵抗命令，日军进攻一路顺利。但在沈阳城，却遇到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率警务人员的抵抗，使第29联队一时无法脱身。至午夜，日军占领沈阳城周围所有据点，黄显声率警察部队撤退至锦州。19日凌晨，第2师团司令部和第16联队开赴沈阳参加战斗，随后，日军大批入城，占领了辽宁省政府、银行、电话局等重要机关部门。第16联队绕过沈阳城，直接进攻兵工厂和东北航空处，并且与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一起进攻东大营。到凌晨6时半，沈阳沦陷，日军关东军将司令部由旅顺迁到沈阳。

江桥抗战前的东北局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9月19日，日军占领南满铁路重要据点安东、营口、凤城、鞍山后，开始扩大占领范围，试图入侵吉林、黑龙江两省。当日下午，日军第3旅团第4联队主力进入长春城，长春沦陷。21日上午第2师团主力向吉林进犯，当晚占领吉林。

至江桥抗战开始前，日军已经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省会和部分重要城镇，控制了包括安奉线、吉长线等在内的多条铁路线。由此也造成了黑龙江省面对日本侵略时，“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的特殊局面。而齐齐哈尔是东北和黑龙江省的战略重镇，嫩江大桥既是齐齐哈尔的南大门，也是从洮南北进的唯一的陆上通道，成为日军与黑龙江省守军争夺的焦点。

中国军民的抗争——江桥抗战

守军与日军的正面战斗始于11月3日，并在19日告一段落。战斗一开始，双方军队的武器优劣就开始显现。日军动用坦克、铁甲车、重炮、飞机等重武器，而守军则以轻武器进行应战。战略上，守军以防御为主，采取一边防御一边后退的战争策略。同时为了持续抵御日军的侵略，战前马占山准备以尚未开始结冰的嫩江为天然防线，并以此为地理优势，布置了中心的三道防线：以大兴车站为主要阵地的第一道防线、以三间房为主要阵地的第二道防线及以三间房后方为依托的第三道防线。

江桥抗战第一阶段

10月13日，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和军事总指挥，谢珂为黑龙江省军事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谢珂令炮兵第9团1个营、卫队团、工兵第7营2个连、辎重营1个连、前往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在桥南埋伏了大量地雷。16日，张海鹏伪军到达江桥南端，与固守江桥的卫队团交战，伪军被迅速击退。为预防伪军进攻，守军将江桥破坏。19日，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后，又将骑兵第1旅调至齐齐哈尔城南布防、步兵第2旅调至富拉尔基布防，同时进行了战前运输、医护等后勤工作准备。

而日军借口嫩江桥被破坏，与黑龙江省政府围绕修桥问题开始了一系列交涉。27日，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关长少佐林义秀要求黑龙江省政府于11月3日将江桥修复完整，若到期未能完工，则由日方派兵强行修理。对此马占山答复“路权属之中国，自行修理，勿庸代谋”。11月2日，中日双方谈判破裂，马占山将会商结果电告在北平的张学良，并表示“将我军集中江桥北段大兴车站，以防来袭”。

3日上午11时，日军以第2师团第16联队步兵第2大队、野战炮兵第2大队、工兵第

2中队组成嫩江支队，在独立飞行第8中队协助下，开至大兴阵地前沿，挑起事端。守军为避免冲突，未予抵抗。

4日上午，嫩江支队在飞机掩护下从大兴车站北进，受到驻守此地的卫队团步兵3营和骑兵连及步兵第2旅两个营的阻击，江桥抗战由此爆发。中午，日军向大兴站左翼渡江发起进攻，被我军骑兵连击退。下午5时，联队长滨本喜三郎率第16联队主力在炮火掩护下向大兴站的主阵地进攻，驻守于此的卫队团奋起迎敌，将其击退，日军在当日的战斗中并未达到占领大兴阵地的目的。为应对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马占山调暂编第1旅于6日前抵达大兴站，骑兵第2旅52团、54团赶往昂昂溪集结。

5日双方继续激战，黑龙江省守军除卫队团应战外，中午后又增兵步兵第2旅第4团、步兵第3旅第5团、骑兵第1旅第4团以加强防御。战斗至午后2时，日军以张海鹏伪军为先锋向守军猛攻，并以飞机在空中掷弹协助进攻，天黑后，日军难以发挥空中优势，黑龙江守军冲出战壕反击，将日军击退。日军的进攻部队不仅毫无进展，反而被中国军队包围，使日军不得不派出增援部队解救被困队伍，其占领大兴阵地的目的并未达到。

鉴于嫩江支队的失败和黑龙江省守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5日对日军兵力进行了调整，“将大约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三个中队的炮兵火速派往嫩江”。

6日凌晨1时，日军向大兴阵地大举进攻，黑龙江省守军以卫队团、步兵第2旅第4团、步兵第3旅第5团正面应敌，骑兵第1、2旅在侧翼防守，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本庄繁当即又令多门二郎率军在沈阳地区的日军队伍急开江桥附近增援，守军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马占山于当日下午六时下令撤到距江桥约50公里、距大兴站阵地约30公里的三间房阵地组织第二道防线，以阻止日军的进一步进攻。

7日凌晨，大批日伪军在10架飞机掩护下，向守军第二道防线进攻，受到步兵第1旅第3团的伏击，骑兵旅长吴松林派骑兵乘势自北向南向大兴站发起反攻，日军处于夹击之中，战至午后将日伪军击退。连续4日的战斗，使日本关东军遭受到侵略东北以来最大的打击和最多的损失。中国军队以1.6万人的兵力，面对同等数量的日伪军（日军1万余人左右，张海鹏部3个团6千余人左右）毫不畏惧，令其第16联队几乎被完全歼灭，骑兵队也死伤较多。鉴于日军损失惨重，本庄繁下令多门二郎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

江桥抗战第二阶段

8—12日，日军顾及各战事将引起日苏纠纷，便停止进攻，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日军在几次试探马占山后，意识到难以在政治上收买或控制马占山，又开始备战。至11日，日军在嫩江北部集结了第3旅团第4联队（欠第3中队）、第3旅团第29联队第1大队（欠第3中队）、第15旅团第16联队、骑兵第2联队、混成第39旅团骑兵第28联队第2中队、野炮兵第2联队（欠第8中队）。嫩江南岸有混成第39旅团野炮兵第26联队第3大队，总兵力超过3万人。而马占山在与日军周旋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军事布防。在黑龙江省守军从大兴阵地撤至三间房后，于7日晚率赴阵地，重新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三间房阵地前沿的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由骑兵第1旅第2、4团驻守于此；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西三家子、三间房、小兴屯、大兴屯、霍托气一带，是守军的主阵地，由暂编步兵第1旅、骑兵第1旅第3团、炮兵第9团、工兵第7营防守；14日后，步兵第1旅第3团和保安第1大队加入正面防御作战。第三道防线在昂昂溪、榆树屯、红旗营子、富拉尔基、朱家坎子一带，昂昂溪是先期作战部队卫队团、步兵第2旅第4团、步兵第3旅第5团从原有阵地撤退后的集结地。在该地尚有步兵第3旅骑兵团、骑兵第2旅，亦作为总预备队待命，构成了第三道防线。总兵力1.3万余人。三间房是中国军队保卫齐齐哈尔的重要防御阵地。因此，争夺三间房成就江桥之战第三阶段的焦点。

江桥抗战第三阶段

12日下午1时许，在炮火掩护下，日军约500骑兵向守军第一、二道防线左翼乌诺头、张家花园和三间房等处猛攻。据守在左翼前沿的骑兵第1旅奋起抵抗，激战40分钟，迫使日军退却。1小时后，日军地空联合轰炸守军阵地，由第15旅团长天野六郎、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信、混成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指挥的左右翼，独立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中路，共计7000多日军分三路呈口

袋式的进攻阵势向三间房推进。暂编第1旅旅长苑崇谷告急，马占山下令增派步兵第1旅第3团进入一线参战。直至傍晚6时，日军在炮兵的掩护下撤退。马占山令三间房总指挥部进驻距三间房30余华里的昂昂溪火车站。

13日下午，被炸坏的嫩江桥修复，日军步兵3000余人在炮兵配合下向汤池、乌诺头、新立屯发动猛攻。守军战至午夜12时，日军占领乌诺头。14日10时，长谷部照信指挥日军2000余人，进攻守军在汤池、蘑菇溪之间的骑兵防线，驻守于此的骑兵第1旅第4团奋力抵抗，双方激战至15日晨。在此期间，马占山侦察到日方大部已经向大兴阵地进发，为能扼守三间房阵地，马占山又急令集结在昂昂溪附近的卫队团2个营增援蘑菇溪阵地，并急调所辖步兵第1旅第3团前往三间房阵地增援。但是日方攻势猛烈，战斗至“午后七时，我军由汤池撤回”。

18日拂晓，日军协同增援的预备队向守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守军左翼第二道防线失守，撤退至第三道防线。进攻三间房阵地的部队，受到暂编第1旅和步兵第1旅还击。下午，日军用炮火将守军战壕摧毁。同时派飞机轰炸省城齐齐哈尔，给城内的民众造成极大恐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黑省军队伤亡惨重，已经难以抵抗日军进攻，马占山考虑到“不忍看垣沦于惨劫，将士同归于尽”，于当日晚上令各防区军队向克山、拜泉、海伦一带撤退。次日凌晨4点，马占山率军政两署人员退出齐齐哈尔，至此，江桥抗战结束，齐齐哈尔沦陷。

战斗中，日军先后出动3个师团，大约3—4万人左右，配备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还有飞机的掩护，伤亡4000—6000人左右。中国军队出动6个旅，大约3—3.5万人左右，装备以轻武器为主，伤亡1万余人。按照江桥抗战的过程，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1月3—7日的大兴站战斗，期间守军歼灭大量日军先锋部队，延缓日军进攻步伐；第二阶段是11月8—11日，日军停止大规模进攻，战事暂时停滞，双方进行政治周旋；第三阶段是11月12—18日的昂昂溪战斗，期间日军集结大量兵力，对三间房主阵地发起总攻，守军抵抗失败撤出齐齐哈尔。

战斗从11月3日日军进攻嫩江桥为开始，直至马占山率领黑龙江军政两署在11月19日从齐齐哈尔撤退为结束，历时15日，期间以大兴站和三间房阵地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实力相差悬殊，加之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始终没有给予黑龙江军民实质性援助，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战斗过程十分悲壮。

江桥抗战结束后，马占山的部队被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一部分继续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一直战斗到抗战胜利；另一部分进入苏联，辗转回国后，在陕西、内蒙古一带继续抗战。

江桥抗战，以马占山部撤离齐齐哈尔告终，中国军队的反侵略抵抗失败了。对于国内而言，江桥抗战是抗日战争中首次我国以正规军与日军进行战场上的直接对抗，是局部抗战的重要战斗之一。它被看作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性符号，为之后的全面抗战树立了榜样。

对于国外而言，20世纪30年代，世界法西斯联盟正在逐步形成。在二战前，埃塞尔比亚、西班牙、中国三个局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最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桥抗战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客观，说明江桥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内在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不抵抗的状态。而在江桥，马占山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面对强敌，体现了中国人敢于抗争的勇气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牺牲精神。1938年9月马占山到访延安，毛泽东欢迎晚会高度评价了马占山江桥抗日的行为。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肯定了“江桥抗战”的历史地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江桥抗战虽属于中国抗战的局部战役，但浴血奋战拼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官兵的无畏精神，唤醒了民众，振奋了民族精神，吹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掀起了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汹涌澎湃的救国图存热潮，具有重要影响。